



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IDEG 研究通讯

第 13 期

(产业政策研究专题)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编 2018 年 6 月

本期目录

【学术活动】	2
“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高层论坛	2
CIDEG 产业政策专题研讨会	3
CIDEG2017 学术年会：聚焦结构性改革——来自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4
“产业政策·理念、比较与中国的实践”研讨会	4
【观点】	5
薛澜：新兴技术与产业的适应性监管	5
八田达夫：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	7
魏加宁：谈中曾根康弘、小泉和安倍政府的竞争政策	9
吴敬琏：加快产业政策转型	10
星岳雄：中国的未来——以日本为鉴	11
巴瑞·诺顿：结构性变革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很重要	14
【研究项目】	16
江飞涛、张永伟：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研究	16
江飞涛、李晓萍：产业政策中的市场与政府——从林张产业政策之争说起	16
【媒体声音】	19
新浪财经：陈清泰：中国产业政策地位之高前所未有 已成转型障碍	23
新华网：吴敬琏：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28
财新网：吴敬琏：合适的产业政策要能够推进竞争	31
腾讯财经网：德地立人：中国既要产业政策也要竞争政策	34

【编者按】

自 1987 年我国正式引进产业政策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在经济发展追赶的前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得有失，得大于失，而在经济发展追赶的中后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失有得，失大于得。但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具有显著的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的特点，实施效果不佳且带来诸多不良效应，产业政策转型迫在眉睫。

产业政策一直是 CIDEG 的核心研究方向，从 2016 的“林张之争”开始，CIDEG 陆续组织了关于产业政策讨论的各类研讨会和论坛，从中日产业政策的对比、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不同国家产业政策的理念与中国实际的对比等角度，邀请各类资深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7 年，CIDEG 在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的建议下，特设立《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研究》研究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江飞涛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共同主持研究，该研究在中国产业政策长期干预市场、限制竞争，实施效果不佳且带来诸多不良效应的背景下，探讨了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方向，以及在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如何协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研究内容，取得一定的成果。

产业政策的问题与顶层设计问题密切相关。产业政策问题讨论的争锋点是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总结四十年来产业政策执行的经验与教训，充分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加快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变显得尤为重要。

本期《研究通讯》将 CIDEG 近年关于产业政策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学术讲座活动及相关的媒体报道摘编如下，供各位专家学者参考。

【学术活动】

● “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高层论坛

2016年10月24日，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CIDEG共同举办的“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高层论坛”在公共管理学院一层大厅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为本次论坛致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蓝志勇教授、王有强教授、巫永平教授、薛澜教授、郑振清副教授、周源副教授及蒙克助理教授参与了此次论坛并做主旨发言。论坛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副主任陈玲主持。来自校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现场聆听了会议，本次论坛特进行了微信现场直播，近千名访问者通过微信直播观看了论坛现场。

在论坛现场，与会学者相互讨论，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薛澜教授为论坛致辞，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的处境，此次论坛的举办，是希望在对产业政策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融入政策学等视角的考量，分析如何使产业政策的决策和运行更为合理，并从市场不成熟及市场失灵、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失灵及产业升级过程中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行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目前产业政策发展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巫永平教授结合近来产业政策领域的学术讨论热点，梳理了产业政策的基本问题，为在论坛中展开认知一致的讨论奠定了重要基础；蓝志勇教授以“综合公共政策理性视阈下的产业政策”为题进行主旨发言，蓝教授深入浅出地从公共政策多维理性、综合公共政策的新时代、有效的政策评估及良性配套等角度剖析了产业政策的发展与现状，并阐明了经典经济学理论用于产业政策分析的优势与局限，及社会保障体制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王有强教授指出，需要用协同治理的视角看待产业政策，并展开了四方面内容的阐释；郑振清副教授主要从社会治理角度，为我们丰富了对产业政策的理解、尤其是汲取东亚其他国家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提供了新的启示；助理教授蒙克提出了产业政策“三个世界”的划分，即一般规制、财政激励及价格扭曲；周源副教授以“战略新兴产业政策干预方式的问题与趋势”为题，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特定分析对象，着重分析了这一特定领域的产业政策；最后薛澜教授分享了对于产业政策的创新见解，做了题为“新兴技术与产业的适应性监管”的精彩演讲；在嘉宾讨论环节中，主持人陈玲副教授结合学术

界争论的热点议题及参会代表们的兴趣关注，向嘉宾提出了多项问题，引领了论坛与会嘉宾间的热议讨论。纵观整场论坛，七位嘉宾从产业政策界定及内涵、多视角的产业政策分析、协同治理的实现、社会治理优化的产业影响、东亚产业政策经验的辩证分析及新兴产业政策的适应性监管等多个方面做出了充分探讨，为参会的专家学者奉献了一场难得的思想盛宴，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 产业政策专题研讨会

2016年11月12日上午，由CIDEG主办的“产业政策专题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302会议室举行，陈清泰、吴敬琏、八田达夫、越泽明、胡鞍钢、兰志勇、张永伟、江飞涛、陈玲等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建议委员会专家顾问、CIDEG执行理事长德地立人先生主持了会议。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畅所欲言，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命题。吴敬琏主席回顾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引进产业政策以后，运用了日本在战后早期一直到七十年代执行的政策和经验；八田达夫教授发表了题为《经济增长战略中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演讲，指出经济增长战略有两大政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而产业政策无法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胡鞍钢教授对八田达夫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点评，认为从中国视角来看，除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外，还要讨论创新政策、环保政策和开放政策，经济增长的五大政策之间存在协调和关联；张永伟研究员做了题为《产业政策的定义与转型方向》的演讲，聚焦引进产业政策之后怎样让它成型，从而影响我们的产业；江飞涛研究员做了题为《国的产业政策与当前产业政策之争》，就中国产业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主要内容、主要特征、不良政策效应、制定程序上的缺陷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提出中国应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陈清泰理事长指出上世纪80、90年代计划经济转型的过程，国家计划管理由产业政策接手，为政府推进改革提供了一种不错的选择。研讨会对产业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至于如何运用以竞争政策为主的政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CIDEG2017 学术年会：聚焦结构性改革——来自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2017年5月20日下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2017学术年会”在清华经管学院一层报告厅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聚焦结构性改革：来自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年会特邀请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CIDEG学术委员星岳雄和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CIDEG学术委员八田达夫先生做主题演讲。年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星岳雄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未来——以日本为鉴”主题演讲，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教授 Barry Naughton，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博源基金会理事、CIDEG理事秦晓，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参与了上半场的点评和讨论。八田达夫先生在年会的下半场发表题为“中曾根康弘、小泉和安倍政府的竞争政策”的主题演讲，国家外国专家局专家建议委员会专家顾问，CIDEG执行理事德地立人，津上工作室主席，CIDEG特聘研究员津上俊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CIDEG学术委员高世楫参与了点评和讨论。年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研究员，CIDEG理事长陈清泰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CIDEG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做总结发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副主任陈玲主持会议。CIDEG理事会及学术委员会数位成员出席了本次年会，现场200多观众和近5000名网友通过视频直播共同参与了讲座。

● “产业政策·理念、比较与中国的实践”研讨会

2017年11月30日，由CIDEG主办的“产业政策·理念、比较与中国的实践”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620会议室举行，陈清泰、薛澜、江飞涛、宋磊、顾昕、汪德华、黄少卿、张钟文等学者参加了研讨会，CIDEG副主任陈玲主持了会议。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对产业政策的看法进行相互交流。CIDEG理事长陈清泰在致辞中回顾了产业政策执行20多年来的得失，提出我国产业政策转型已经有了十足的紧

迫感；江飞涛副研究员进行了《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的转型研究》的项目阶段性成果汇报，提出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应转为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宋磊教授做了题为《从执拗低音到明快主旋律：日本经济政策体系之中的竞争政策的地位的演变》的演讲，认为理解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关系时要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对产业政策重新分类，而是对竞争政策重新分类；张钟文博士后做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用机制的研究——基于特惠模式的视角》主题发言，系统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时期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揭示了其影响机制，并提出了产业政策的另一个方向；顾昕教授做了《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的主题发言，强调创新的核心地位，并指出政策创新的两个要点——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汪德华教授做了题为《财政视角下的产业政策》主题演讲，明晰了产业政策的中国特色，并提出从产业规划到财政支持的“过程”与“效应”亟待研究；黄少卿副教授进行了现场点评，认为要让产业政策起作用，公共治理的大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会议对嘉宾的专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讨论。

【观点】

● 薛澜：新兴技术与产业的适应性监管

2016年10月24日，清华公管学院院长、CIDEG主任在“产业发展与国家治理”高层论坛发表题为“新兴技术与产业的适应性监管”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整理内容：

对于第一新兴产业，产业发展的路径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实际上跟技术相关。有些技术的突破，比如基因检测技术，九十年代中期的成本上十亿，今天可能一千美元，所以成本大幅度下降。再如半导体技术，现在如果按照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以及成本下降情况，结合摩尔定律，来谈论半导体技术的性能提高，它的价值下降比基因检测技术还快。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所以技术发展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新的趋势，跟这些也是密切相关的，这可以提前预测。以网约车为例，现在网约车可能是在提供出租服务，面临类似于出租服务的竞争。但是也有人说跟价格相结合，再跟人工智相能结合，又是新的情况。现在很难想象这些新兴产业的未来，会给人们创造什么样的产业，甚至有可能很难去定义到底在哪个产业里。技术发展、商业模式的发展，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在政府部门，在学术界，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不确定性。第二点就是对社会的影响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一方面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想象不到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带来享受。但是这种新兴产业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像基因检测，好处众所周知。现在谈精准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基因检测，根据基因检测能够分析出疾病的概率，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对预防疾病有很大的好处。另外一点，提供临床检测服务也有很大问题。如果病人检测出患某种疾病的机率是40%，假设病人心理素质不太好，会担心有更高几率患病。

另外一方面基因检测的安全信息如果泄露，会导致诸多问题。比如被检测者就业的时候，因为患上某种疾病的概率大小，用人单位可能会拒招；再如现在有各种网上婚恋的网站，如果首先提供的是基因检测信息，后果难以想象。另外一点是对传统产业的颠覆作用，政府对企业的规制也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人们在网上约车，就是车主利用其业余时间去载客，这算不算就业，谁是雇主。再如，像商宴活动，网上约车到底要不要交税，这些都没有。目前我们以什么样的法律作为依据，不是立刻能提出来，新兴产业的特点确实给我们提出来很多的问题。

首先，产业的监管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来进行规制，特点是高度的确定性和连续性。那么对产业进行规制的法律法规，是经过非常审慎的过程和利弊分析，最后提出的。规则提出要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但是新兴产业的特点是瞬息万变，传统的规制一旦提出来就不轻易改变；而产业的规则还没出来，产业可能已经消亡，或者变成另外一个新的形态。传统运行规则是否还适应这种现状不得而知。一类是经济性的规制，或者说对产业的垄断性。但是有些产业有外部特点，像微软的软件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使用，但是有很多的操作软件可能人们还不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路径依赖的现象很多。所以这种条件下，按照传统的反垄断的角度去解决，跟实际有冲突，有很多自然垄断的特点，另外一个也是变化快。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www.cideg.tsinghua.edu.cn/info/gd/2961>

● 八田达夫：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

2016年11月12日，在CIDEG主办的“产业政策研讨会”上，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前日本经济学会会长、学术委员八田达夫发表主题演讲，指出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以下为发言内容整理：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有何不同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实现经济增长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但是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区别很大。产业政策就是通过先制定目标，按照目标推动目标产业的增长，也就是政府对要推进的方面予以帮助，比如贸易保护或者关税保护以及一些政府的对于税收的减免和提供优惠的贷款，还有行政保护等方面的政府做出支援的行为。竞争政策就是为了促进竞争要完善环境，将其余的部分全部委托给市场来办。像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都是为了促进竞争，完善竞争的环境。具体的做法比如反垄断的政策、贸易自由化以及取消政府的管制的行为。总之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产业政策是推动政府想要推动的地方，而竞争政策是要支援的地方并不是由政府来决定。以日本的产业为例，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竞争政策。

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并不合理

所谓的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不合理的。首先是规模经济，从当前情况看，我们应当让民间去判断某一个行业到底有没有前途，如果民间认为它能发展，它便能从它所能带来利润的能力上获得投资，那政府便没有必要进行补贴。其次关于外部效应，这个政策其实是为了保护创新，而我们只要建立了相关的法律体制，在其框架下可以让进行发明的企业在自己产业内部获得相应的利润，没有必要对该产业所有的企业进行补贴。最后一个关于克鲁格曼的战略贸易理论，其实是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人们对日本的产业政策存在误解

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之中，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日本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取得经济增长，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这其中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日本产业政策中最有特点的

是对于出口的补贴。理查德·本森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以日本为数众多的产业作为对象进行分析，结论就是他认为无从证明生产力的提升就是政策措施的后果。东京大学的大桥弘教授也对钢铁行业的出口补贴问题，进行了基于统计学的非常严谨的分析，他的结论是，钢铁出口增长了，并且日本政府也对于钢铁的出口进行了补贴，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

其次，日本的产业政策针对低速增长的行业部门和没有规模效应的行业部门进行了补贴。马库斯·诺兰和霍华德·帕克也在他们的著作《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政策：亚洲的经验与教训》中提到，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整体上来说，如果放到经济产业省以外的部门来看，矿产品和农业都得到了更多的补贴，而这两者是没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事实上，有许多企业都是没有获得政府补贴的，包括索尼、松下、本田，但是这几个企业都成为了日本非常著名、耳熟能详的出口企业。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竹内弘高先生也列出了包括工业机器人、空调等一系列产品相关的制造业，而他们都是没有政府扶持但是却成功发展的产业。因此，针对新兴产业而非夕阳产业进行的政策补贴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因为这种产业不去补贴它也会发展。

竞争政策才是日本经济至今成长的关键

日本的经济从 1974 年开始一直是高速增长的，然后突然增长率就下降了。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移动下降，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没有采用新的竞争政策。那些既得利益者，既得权利的人，去使侵犯他们利益的政策不能出台。

现在，安倍经济学带给日本经济以一系列好处。第一件事情是放开居民用电的电力市场。第二是建立国家战略特区。可大可小的特区之内，可以不遵守现有的法律，突破现有法律的限制。日本能否重获强大的经济能力取决于它实施竞争政策的力度。而这也适用于其他任何经济复苏之中的亚洲国家。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www.ciddeg.tsinghua.edu.cn/info/gd/2950>

● 魏加宁：谈中曾根康弘、小泉和安倍政府的竞争政策

2017年5月20日，在CIDEG2017学术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就日本竞争政策发言，认为日本即使在实施产业政策的时候，也是强调自由企业制度。以下为发言内容整理：

刚才八田达夫先生对日本的经济政策演变做了很好的梳理。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进行梳理，左边是产业政策，右边是竞争政策，梳理时就会发现其脉络非常清楚：战后初期的时候，在美国占领军的压力下，当时实行的是解散财阀等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是在强化竞争，废除统治经济；后来，由于冷战爆发以后，美国开始改变政策，要求日本经济自立，在此过程中，日本的产业政策逐渐得到强化，而竞争政策，包括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弱化的。从70年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产业政策开始逐渐弱化，而竞争政策则在不断强化。产业政策从过去的“行政指导”变成了后来的“展望指引”或“指南诱”，实际上是朝更富有弹性的方向转变。大的脉络就是这样。

关于八田先生讲的几次改革的案例，我们非常感兴趣，对中国也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梳理日本的产业政策史时看到，日本即使在实施产业政策的时候，他也是强调“自由企业制度”，企业自主决策，风险自担。但是有少量的“公社”，也就是国有企业。

从中曾根康弘当首相时开始，日本对这些过去被认为是公共领域的少量的公社开始进行改革。中曾根康弘的改革主要是所谓“三公社”民营化，一个是国有铁路民营化，再一个是NTT即电话电报公社的民营化，还有一个就是烟草专卖公社的改革。

关于日本的国铁改革很值得研究。2008年左右，我们为了推动中国的铁路体制改革，曾经把日本的国有铁路改革的全过程写了一个报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展开，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到国研网上去查看，2008年挂出来的。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www.cideg.tsinghua.edu.cn/info/gd/2574>

● 吴敬琏：加快产业政策转型——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去年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场引起了学界、产业界、政界广泛关注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这场讨论影响很大。我自己看了他们两个的意见以后，也做了一些学习和研究，今天我就想把我学习的一些收获跟诸位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关系到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但是去年的讨论在我看起来有一个缺点，在那个讨论开场的时候主持人就说了，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于是参与讨论的两位教授就各自持有比较绝对的意见，一个就说中国非常需要产业政策，一个说中国不能要产业政策，这就使得整个讨论变成了一个无法证伪的信念之争，很难深入下去，而且也很难对实际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为什么这个讨论陷入了困境呢？关键就在于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是有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当前需要研究和面对的问题，不是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而是讨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我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一概否定产业政策或者一概肯定产业政策的人，其实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因此，有些人心目中想到的产业政策是指 80 年代主要从日本和韩国引进的那种产业政策，或者叫做日本在 50—60 年代所采取的那种产业政策，那种产业政策只是产业政策的一种主要类型，而不是说，只有那一种类型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这个词据说就是日本发明的，而且即使在日本虽然有类似的实践，但是正式提出是在 70 年代。日本战后，对经济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麦克阿瑟占领军当局要求日本否定战时的统治经济，实现自由化。所以在占领当局的压力之下，日本做了一些自由化的改革，比如说道奇计划放开了价格，实现了价格自由化，加强了反垄断立法，解散了财阀，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朝着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但同时日本还有另外一种倾向，这个倾向就是继承了战时的统治经济那种体制的遗产。

一位华裔的美国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做《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里面详细讲述了日本战后，特别是在 50 年代、60 年代所实行产业政策实际上延续了日本战时形成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很特别，这些人有两重角色，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这本书说的很客气，叫民族主义者，有人说的不客气就是军

国主义者。

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允许在大学里教书的，所以这些人，一部分到了研究岗位，一部分就到了东北，当时在伪满洲国推行统治经济，而到战后这些经济学家回到日本后，就成为了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推手。

一个是日本过去战时统计经济的遗产，另外一个就是这批经济学家的助推，这样日本经济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采取了一系列的后来命名为“产业政策”的一套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这种产业政策主要是两种，一个是产业结构政策，另外一个叫产业组织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前者。

引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引的《日本产业政策》里的描述来说，产业结构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运用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的手段，有选择的促进某种产业或者某些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现代化，和产业的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讲就叫做“有保有压，选择产业”。所以这种产业政策后来就被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但是我们在去年和今年的讨论中就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情况，其实产业政策还有别的选项，还有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这在我们引进产业政策的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日本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石油价格猛涨，发生了长达四年时间的经济衰退，从 60 年代 10% 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负增长，这个时候许多有识之士就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怀疑。因为在 70 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高速增长就是得益于产业政策，但是石油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就开始怀疑这套产业政策的正确性，特别是一些受到现代学教育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质疑。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www.cideg.tsinghua.edu.cn/info/gd/2638>

● 星岳雄：中国的未来——以日本为鉴

2017 年 5 月 20 日下午，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CIDEG

学术委员星岳雄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2017 学术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未来——以日本为鉴”主题演讲，星岳雄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比了中日的经济发展情况，包括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热潮和僵尸企业。其在报告中指出，我国与日本经济发展十分相似：都是赶超型经济，资本积累型，汇率稳定，政府发挥作用大。目前中国的经济将继续走赶超道路，快速发展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从储蓄的角度来说，中日经济的发展都有储蓄支撑，星教授通过分析日本经济历史发展的状况，进一步指出了中国面临的失衡问题；在金融热潮问题的阐述中，其中星岳雄教授提到了 Lardy 的研究，Lardy 认为中国的金融热潮不至于引起金融危机，但这些理由与当时 80 年代人们认为日本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一样；最后，星教授还从僵尸企业的角度对中日两国发展问题进行了对比探讨，他认为，低效率的僵尸企业由于银行或政府的支援苟延残喘，这样不仅挤占了提供给健全企业的资金，而且与健全企业的竞争也会进一步阻碍健全企业的扩大，日本和欧洲的僵尸企业出现在金融热之后，但是中国的僵尸企业却是出现在金融热之前，而我们能在早期认清这些问题是很好的，这样才能将因之产生的损失降到最低。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多相似之处

星岳雄认为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历程，并指出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时间有所不同的，但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两国的经济增长都是追赶型，都是从发达国家那儿引进先进技术，然后用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和很高的储蓄率获得发展；第二，家庭的高储蓄率导致资本积累很快；第三，外汇汇率稳定；第四，都是政府主导经济。和曾经的日本一样，中国经济也出现了放缓现象；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能够顺利摆脱经济衰退，进入新常态。尽管如此，日本过去经验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热潮和僵尸企业。

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都是追赶型

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因而最终在经济发展上能与发达国家趋同。

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的 GDP 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了发展中国家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其中，中国的人均 GDP 较低，增长潜力较大。因此，尽管中国经济现在放缓，但仍可以继续走追赶型道路，依然会保持较快增长。从知识产权的进出口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目前依然依赖进口，从出口技术中获得收益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因此可

认为中国的追赶型的增长还没有完全结束。

日本此前的泡沫破灭使得我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保持警惕

现在的中国和八十年代的日本一样，都有很高的国内的储蓄支撑。日本八十年代的过剩储蓄由于不能够转移到国外，因而减少日本的贸易赢余，引发了国内失衡，最终催生了泡沫。

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国际失衡问题。中国过剩的储蓄，过去通过出口的方式转移到国外，但海外出现金融危机后，过剩的储蓄只能在国内消化，因而出现了资产和金融的热潮。星教授认为，对外的失衡得到解除，反而引发了对内的失衡。

面对现在中国的金融热潮，多数人的共识是不需要过于担心，许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中国的金融热潮不会引发金融危机的理由。但星教授指出，现在提出的中国不出现危机的理由跟八十年代提出的日本不出现危机的理由相同。日本之后出现的泡沫破灭也提醒我们应当对于中国的金融热潮保持充分警惕。

中国应尽量让僵尸企业破产或者重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把影响减少最小

僵尸企业在正常的市场竞争应该被淘汰出去，但由于银行或政府的支援才得以苟延残喘。僵尸企业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阻碍经济增长：第一，僵尸企业效率低；第二，僵尸企业和健全的企业一起竞争，妨碍高效率企业的扩大，也妨碍新的企业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第三，僵尸企业会占据一些优秀的人才；第四，僵尸企业的存在导致一些资金不能够流向健全的企业。

日本、OECD 和中国僵尸企业的情况。其中，日本的僵尸企业占比在泡沫经济破灭的九十年代初开始增长很快，而 OECD 的八国的僵尸企业占比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也很高。这两个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出于对于就业的考虑对很多企业进行了保护。然而在中国，僵尸企业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出现了。今后如果金融危机发生，那么为了保就业，政府可能进一步推出政策来维持僵尸企业，那么僵尸企业的情况就会更加严峻。但在危机之前意识到僵尸企业的问题也是一种幸运。星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应尽量让这些僵尸企业破产或者重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把僵尸企业的影响减少最小。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www.cideg.tsinghua.edu.cn/info/gd/2960>

● 巴瑞·诺顿：中国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国际性产业政策

1、国际社会对中国产业政策态度复杂

现在“供给侧改革”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描述中国产业政策的词，但国外对中国产业政策有一些很复杂的反应：一方面有不少人非常支持中国的产业政策，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觉得现在正好是一个新技术革命的时期，纵观各国，事实上只有中国是有远见和志向，而且愿意投资必要的人力资本，去实施一系列具体措施。这是令很多人非常佩服的。

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反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或者是担忧中国的产业政策会引起非常大的冲突和引起不利的后果。因为那些人看到中国变得更加中产阶级化，太注重战略性的经济政策，他们担心中国促使本国企业在各个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当然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他们的企业能够得到一些主导的地位，但是看很多人觉得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在竭力保护自己的企业和主导一些重要的行业。

当然产业政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讨论。我只是着重简单的一部分，就是一个产业政策应该是长期的并且是战略性的，但是现在中国的产业政策并不是真正战略性的，很多短期的因素和考虑都影响到了中国的产业政策，而且中国到了现在还没有很完善地考虑到国际伙伴和竞争者的反应。

2、产业政策视角下的中美博弈

一个比较敏感的例子是现在美国特朗普当局的政策，这些政策我是非常的不赞成的。因为特朗普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政策我认为是非常糟糕的，主要有四点：第一点，特朗普政府反对双边贸易产生美国方面的赤字，这是我们经济学家都不能接受的观点，特朗普还是继续强调这个问题。第二点，他不太理解产业链，不知道那些产业链对美国公司有什么好处。第三点，全盘反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尤其是“中国制造 2025”。第四点，没有以此为契机与一些潜在的同盟者团结起来，比如没有跟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达成一些协调性政策。

所以，我非常不赞成现在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但是，我想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虽然贸易战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到了现在很少有国家或地区跟中国同盟起来反对美国的措施。中国声称有意识领导国际化进程，但是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加入中国领导的同盟，为什么美国政府的那些政策为什么没有更多国家来反对？

一方面必须看到，中国到现在应对特朗普做的很不错，对特朗普的每个威胁采取“以牙还牙”策略，这通常是最优的博弈策略。同时，中国也给美国“下台阶”的机会，好几次暗示特朗普政府减小贸易惩罚力度，中国已经给了特朗普好几次可以退出战场的机会。另一方面，我要强调的是，特朗普是一个短期的挑战，特朗普政府的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 1/3，所以中国应该有一个长远的战略来处理挑战。现在中国最应该做准备应对的是什么？就是在美国国内，而且在国外一些其他的国家，更多声音倾向于赞同“对中国的政策应该强硬”，我觉得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真正的长期挑战。

3、中国产业政策如何应对长期挑战？

第一，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应该承认中国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领导者之一，尽管现在中国的人均 GDP 还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如果看到中国的人才、规模、规划，那中国确实已经是全球领导者之一，那么领导者有哪些责任？如果领导者只考虑本国的利益，这就会迫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他，所以中国最优的政策就是要吸纳其他的国家来谈判、合作、竞争。

第二，要鼓励公平竞争。中国有能力主导所有高科技产业部门吗？显然不可能。这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世界上那么多有高科技力量的国家如何平衡？哪些产业在什么地方发达？哪些企业要实现成功的战略？怎么决定？按照什么原则来决定？其实这些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只有公平竞争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主要的原则，完全值得中国政府明确的说，“我们接受最后的工业布局被公平竞争所解决”。刚才隆国强教授说的很清楚，中国已经从过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过渡到一些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但是在这些产业跟国外的竞争是面对面的。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共同认识的、公平竞争的原则，面对面的竞争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是最有效的途径——把新技术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把新技术革命的好处分到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人民。如果

没有这个共同的认识，那肯定就是冲突。

此外，公平竞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OECD 已经有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完全是可以被中国接受的。如果接受公平竞争的原则，那中国也应该接受这一点：处理掉那些接受短期补贴而没有成功的企业，使之破产或被并购等。

所以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就是中国宣布将要实行一个“开放性的产业政策”。刚才隆教授说的这些政策、规划我都非常赞成，但是我感觉，那些政策每个都是国家主导的，所以虽然是一种开放，但都是一些“不开放的开放”，因为他们都是选一些特殊情况下的政策来进行逐步的开放。我如果可以代表国外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现在这些政策还没有触及“开放”的根本，比如说服务产业，其实现在中国服务产业的壁垒比所有其他 OECD 国家都高，而且比很多不属于 OECD 的国家如印度、巴西都高，所以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

最后，希望中国能够重申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原则上是允许外国企业、私有企业、国有企业公平竞争。虽然负面清单（注：政府规定的不开放的那些经济领域）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希望那些负面清单只包括主要幼稚产业而不是所有幼稚产业，各国产业政策的结果都应该取决于公平竞争。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www.cideg.tsinghua.edu.cn/info/gd/2956>

【研究项目】

江飞涛、张永伟：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研究

《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研究》项目是 CIDEG 课题，近期已结题。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江飞涛主持。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中国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本项研究从产业政策的内涵、产业政

策制定的理论支撑或进行反面证伪的分析、既有产业政策的实践结果以及就产业政策争论的融合和未来发展趋势四个方面，重点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入辨析：①产业政策是否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解决“市场失灵”问题？②政府是否可以挑选出合适的产业进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③如何衡量产业政策的有效性？④未来经济的发展是否需要产业政策，若需要，如何实施？

【研究报告摘要】

长期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具有显著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的特点，实施效果不佳且带来诸多不良效应。2016年，产业政策在中国引发大争论，但是仍然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本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探讨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方向，以及在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如何协调。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产业政策中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以及两者的关系，指出产业政策中，市场应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应“完善市场制度，增进市场机能，扩展市场作用范围，补充市场不足”，两者是互补与协同的关系。

本文接下来探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及其演变，指出高速成长期竞争政策也没有完全失去对于产业政策的限制作用，高速成长期结束以后，竞争政策成为日本政策体系的主旋律。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市场友好，开放竞争”的产业政策体系及政策理念，欧盟的产业政策始终坚持“横向性”与“产业政策服从竞争政策，并与竞争政策协同”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随后，本文阐述分析了中国的产业政策的类型、层次以及主要政策工具，并指出中国产业政策具有显著的干预与限制市场竞争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在大量干预与限制竞争的管制性政策，二是中国通过产业政策选择性，往往有违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这种模式的产业政策带来诸多不良的政策效果。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中国产业政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挑选赢家”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并没有挑选出增长率高的行业，而且产业政策的实施也没有促进行业增长率的提升，选择性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

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以推动市场集中为导向的产业组织政策，这类产业政策具有显著的干预与限制竞争的特征，这类产业组织政策的基本逻辑和理论依据存在严重缺陷，并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中国的产业组织政策，应转为以市场公平竞争来促进产业组织的优化调整。

本研究关注到中国之所以长期制定实施干预市场、限制竞争且效果不佳的产业政策，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模式，具有过程封闭、官僚主导、缺乏有效制衡的特征。在这种政策制定模式下，行政官僚体系倾向于制定为本部门寻求更多干预市场（竞争）权力的产业政策，这包括寻求更多的管制市场与竞争的权限、支配更多的财政资金等。这种政策模式还带来信息交流不充分进而影响政策质量，以及政策模糊化、政策碎片化的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转向“市场友好，竞争中立”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服从竞争政策，遵循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政策工具方面主要采用功能性、服务性的政策工具。例如，科技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的建设，提高劳动者技能，促进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支持科学研究及通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等，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并不会对公平竞争产生不利影响。即便是促进创新与研发活动的补贴，也主要是以普惠形式发放，主要针对竞争前的技术研发环节。本研究进一步指出推动中国产业政策转型、提升产业政策质量的关键，在于重构产业政策制定的程序与组织机制，并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嵌入其中。

🔍 研究报告全文下载: http://www.cideg.tsinghua.edu.cn/info/zxyjbg_/2949

【工作论文】

江飞涛、李晓萍：产业政策中的市场与政府——从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说起

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展开的争论颇具影响，黄益平、顾昕、田国强、文贯中等学者相继加入讨论。从这场争论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是产业政策的存废之争，不如说是产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之争。整个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在产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与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围绕产业政策中政府的作用、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及两者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这场争论之所以具有轰动效应，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对于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中具体如何厘清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无论学术界还是政策部门仍存在不小的争论。对于怎么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各界在具体认识上也存在分歧。这场争论对于进一步认识产业政策中的市场和政府是颇为有益的。但是，这场争论对于市场机制与功能的理解，对于产业政策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仍有需要进一步补充、探讨的空间。

本文正是试图弥补以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本文首先回顾了产业政策争论主要参与者关于产业政策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相关观点及依据，然后对这些观点及依据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指出其中的问题或不足，接着系统地探讨产业政策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未来中国产业政策转型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何转变。

产业政策争论中的市场与政府

产业政策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市场与政府应该是怎样的关系。2016年下半年的产业政策大讨论，许多学者都参与其中，但林毅夫、张维迎、田国强、顾昕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在此，本文主要介绍以上四位学者的观点及相应依据。

(一)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视角》[1]一文中系统阐述了他关于产业政策及产业政策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看法。在林毅夫看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有效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通过价格体系)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以引导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只有如此,“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企业才可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有机会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林毅夫认为“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而识别这种潜在比较优势也需要以有效市场反映各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为前提。对于什么是有效市场,林毅夫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而在林毅夫的弟子、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者王勇的论文《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中,给出了有效市场的定义,“如果一个市场是有效的,那就意味着通过价格信号和价格体系就能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有效”。

在林毅夫看来,由于公共物品、信息外溢、协调失灵等市场失灵的存在,要实现产业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仅仅有“有效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为政府”。对于什么是有为政府,林毅夫也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只是说有为政府必须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过程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提供必要的激励(例如,税收优惠,资本管制国家提供进口设备的外汇额度,金融抑制国家提供优先贷款),要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要为接近前沿的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基础科学研究上的支持。

对于有为政府,林毅夫指出,“以‘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从事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协助手段就包括以上提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建设、基础科学研究等。林毅夫又将“有为政府”称之为“因势利导”的政府。对于“有为政府”如何“因势利导”,林毅夫提出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两轨六步法,“第一轨甄别,什么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二轨,根据这个产业中企业降低交易费用的需要,因势利导,改善软硬基础设施,使其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林毅夫还介绍了如何通过六步法来甄别产业进行扶持。

(二)张维迎: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视角看市场机制、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

张维迎在《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3]一文中，阐述了他对于产业政策、市场机制的基本看法。在该文中，张维迎首先界定了他所理解的产业政策，即“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物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张维迎从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视角来理解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看来，“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是一个认知工具，市场竞争是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新的合作机会的过程；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不是均衡”。而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张维迎则认为是“市场理论的失灵”，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失灵”。张维迎进一步指出，信息的外部性并不会阻碍企业家的创新，至于协调失灵，市场中的企业家总是会在利润的诱导下，寻求到解决协调失灵的方法。

张维迎尤为强调企业家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过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和套利，市场才趋向均衡；正是企业家的创新，使得市场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由此推动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其原因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产业政策作为一种集中化的决策模式，需要决策者对未来主导技术、主导产业及发展路径有准确的预测，但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限制，创新与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实现创新、发现新产业的唯一途径是分散化的经济实验，“每个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警觉性、想象力和判断力来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然后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谁是最后的成功者(例如，市场的主导技术、新的产业、主导企业)。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既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政府官员很难像企业家一样行动。产业政策还会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和设租行为，扭曲激励机制。因而，张维迎反对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

(三)田国强:市场失灵、有限政府与产业政策

田国强则在《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对与错:兼谈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

《争议产业政策:有限政府, 有为政府?》[5]等文章中, 详细阐述了他对市场与政府关系、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的看法。田国强指出, 林毅夫提倡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存在内在逻辑冲突, 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田国强指出, “所谓有限政府指的是, 只要市场能做的, 就应让市场发挥作用, 只有市场不能做或失灵时, 政府才应发挥作用, 从而才可能导致好的市场经济或有效市场”。田国强指出, 有限政府“聚焦于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与市场保持一臂之隔”, 政府的行为边界更为清晰, 而林毅夫提出的有为政府, 其边界几乎是无边界的, 同时又排除了政府一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无为的至关重要性。

田国强在《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对与错:兼谈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一文中亦对张维迎的部分观点进行了质疑, 田国强认为张维迎完全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指导作用、否定市场失灵是缺乏依据的, 并指出将产业政策中的激励问题简单归结为官员或经济人的无耻也是欠妥当的。田国强进一步指出对于产业政策辩论的焦点不应该是需不需要产业政策, 而应该是“政府职能是否需要从全能型、发展型的有为政府转向维护性、服务型的有限政府”。

(四) 顾昕:新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市场与政府

进入 21 世纪以来, 产业政策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丹尼·罗德里克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顾昕在《重建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理论》一文中, 详细考察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丹尼·罗德里克在产业政策领域的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他对于产业政策的主要观点:第一, 产业政策有其必要性, 产业政策的功能是(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弥补市场不足、矫正市场失灵;第二, 产业政策应立足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产业政策不是要替代市场去“挑选赢家”, 而是要为产业发展提供服务;第三, 产业政策的真正问题在于, 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与激励机制, 政府才能为产业发展提供相对有效的服务;第四, 产业政策的研究迫切需要借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与治理的研究成果。

全文请点击链接:



http://www.cideg.tsinghua.edu.cn/upload_files/file/20180607/1528352087691003723.pdf

【媒体声音】

➤ 新浪财经

陈清泰：中国产业政策地位之高前所未有 已成转型障碍

“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6”于11月26日-27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出席并演讲。

陈清泰表示，中国产业政策执行了二十多年，总体上看，在经济发展追赶的前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经济发展追赶的中后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失有得，失大于得。所谓“失”，第一是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市场壁垒依然严重存在。二是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再被固化。第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市场选择和投资决策的权利仍未到位。四是区域市场分割依然存在，没有减退的迹象。

其表示，“中国产业政策的地位之高，几乎是各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已经成为阻碍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障碍。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此消彼涨，把竞争政策提到基础地位，产业政策不能削弱竞争”。

以下为演讲实录：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关于中国的产业政策的研究，因此在这里我想从实施产业政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角度来谈两点看法。第一就是我国产业政策的引进和实施，分几点谈一谈我的观察。第一就是我国的产业政策是在三个条件下引进和推行的，也就是想回顾一下中国产业政策的背景，对具有中国特点的这种产业政策可以有更好的理解。

产业政策在计划经济退出后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九十年代初，中国工业经济的70%仍是受国家计划控制。工业经济的70%为国有经济，而当时的民营经济还处在边缘地位，财政、税收、金融等市场化改革还没有

启动，产业政策作为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一种形式，与计划经济思维和管理方式能很好的对接。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都有待发育的情况下，实施产业政策基本不会触动政府主导生产要素配置的权利，不会动摇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地位。因此，国家计划管理退出并由产业政策来接手，就成为政府推进改革的一种可行的选择。产业政策引进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被政府所接受，成为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次，进入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服务业和基本生活用品等产业的发展，和国土资源规划、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相关，政府有一定的信息优势。以产业政策为抓手，政府可以有所作为。

第三，那个时候经济领域的主要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企业的投资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投资。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承担着管理的责任。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管理，政府和企业都认为较之那种刚性极强的计划管理是一种进步，很容易接受。

在这三个条件下，使政府很快地按照自己的理解，为我所用地接受了产业政策。我讲的所谓“为我所用”就是说按照中国当时的需要。对企业的计划管理较快地过度到了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行政审批。相比之下，政府减弱了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增强了企业活力，与当时的抓大放小、减人增效、政策性破产等配合，产业结构较快地得到了改善。

九十年代中后期，政府主导依托国企，产业政策大规模投资的组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我国以较快的时间走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在计划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追赶的前期，产业政策的正面效应应当肯定。

另外横向产业政策与纵向产业政策。第一横向产业政策那就是指为保证产业发展而采取的普适性政策。例如完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研发费加计扣除、知识产权保护、股票市场的开启、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等等，它为所有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产生了好的效果。纵向产业政策也就是对选定产业实施促进的政策，在那些市场失灵的领域是有好的效果。例如正在实施的重大专项，他们基本上有以下的共同特点。第一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比如载人航天、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装备、

基础软件等等。

第二它带有后发追赶的性质，政府有一定的信息判断力。

第三从长远看，有可能形成或裂变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产业。

第四投资规模很大，短期不能产生平均利润率，市场投资者近期没有投资的意愿。

政府选择这类重大项目，以较大政策力度支持其发展，既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打下基础，又对市场竞争不会产生负面效应，它是实施纵向产业政策较好的实例。

纵向产业政策有很大负面作用

具有中国特点的干预型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继承了不少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干预型产业政策，较大程度上维系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进入新世纪(6.730, -0.08, -1.17%)，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追赶期逐渐过去，非公有经济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这种干预型产业政策基本没有改变。生产要素错配的问题日益严重。这类产业政策的实施有两个政策工具，一个是以市场准入投资项目和生产资质等为对象的限制性审批。审批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重要产业，审批坚持的是有保有压、扶优扶强的原则，也就是保大压小，保国有压民营。

审批的内容深入到技术经济环节，例如投资规模、资金来源、技术路线、产品开发、生产规模、工艺和装备等。审批非常繁复，而且刚性很强。未获准者无法获得生产条件，也不能进入市场。这种做法干预了企业经济技术上的自主权。

另一个工具就是政府对认定的新兴产业、战略产业促其发展，其中很多是在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引导、政策激励和组织协调，由政府进行统筹规划、系统布局、明确发展时序，设定实现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目标，调动财政、税收、金融的力量予以支持。在实施过程中，绕过了竞争的筛选，由政府认定依托企业和某类产品的产业聚集地。

与此同时，以防止一哄而起，盲目投资，避免恶性竞争，提高产业集中度为由，把

大量新进入者挡在门外。这种做法尽管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但是在政府的强干预下，由于市场的导向作用被政府替代，投资的盲目性和被误导的风险上升。由于新进入者被拒，拖延了试错的过程，由于竞争不足，弱化了企业创新力，由于吃偏饭，扭曲了生产成本。由于补贴过度，使企业产生了惰性和依赖。由于审批有很大的随意性，造成了腐败。

产业政策造成不公平竞争

产业政策受到体制的局限，赋予了某些特殊的功能。政府既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国有实体企业与国有金融企业保持着关联关系。再加上政府与国企关系的改革不到位，这就使产业政策不太可能公平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政府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在实施产业政策中不能保持市场中立，产业政策隐性或现性的都有保障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功能。一些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正是以产业政策的名义出现和持续的。例如 2006 年，政府部门明确宣示国有企业要在七个产业保持绝对控制，九个产业保持控制地位。再如进入新世纪，国务院先后发布两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 36 条，也未能破除玻璃门和旋转门。这些政策措施排斥了竞争，维护了旧的体制，造成了结构性的低效率。

地方把产业政策作为推进本地发展和地方保护的工​​具。一方面以廉价土地超规定，减免税收等措施，支持特定的企业。比如前几年，一些地方纷纷以大力度扶持政策，支持光伏产业，很快造成产能过剩。有的地方以本地有庞大加工业为由，在产能已经超常规过剩的情况下，以优惠政策鼎力支持千万吨级的钢铁项目。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实施以投资换市场的政策，逼迫企业重复投资。例如一些城市要求进入本地的出租车、电动大巴、地铁车辆，需要在本地建厂。还有通过市场壁垒来扶持本地企业，例如一些地方根据本地企业产品，量身订制本地的新能源汽车目录，将本地不能生产的车型拒之于门外。再有以种种方式阻止本地企业被外地企业并购，阻止本地企业向外地投资。外地企业与本地企业发生纠纷，往往得不到公平待遇。如此等等，市场被分割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有自己独立特点的，它没有明确的定义，实际上就是

政府以行政力量干预产业的各种政策措施的一种综合。

第二个方面讲一下对产业政策的评估和改革。中国产业政策执行了二十多年，总体上看，在我国经济发展追赶的前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经济发展追赶的中后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失有得，失大于得。我所讲的“失”第一是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市场壁垒依然严重存在。二是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再被固化。第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市场选择和投资决策的权利仍未到位。四是区域市场分割依然存在，没有减退的迹象。

影响产业发展有两大政策，一个是产业政策，一个是竞争政策。在中国产业政策的地位之高，几乎是各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已经成为阻碍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障碍。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此消彼涨，把竞争政策提到基础地位，产业政策不能削弱竞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商事制度改革，制定限定投资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最近提出的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等，都是校正现行产业政策弊端的重要步骤。

此时，应对既有的产业政策进行系统的反思，按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推进产业政策的改革。例如政府不再把产业政策作为保增长，主导生产要素配置的工具。保障市场主体的公平地位，使所有市场活动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垂直性产业政策应限定在中央政府市场失灵的领域和非歧视性，使其不产生限制竞争的结果。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hy/hygz/2016-11-27/doc-ifxyawmm3527483.shtml>

来源：新浪财经 2016 年 11 月 27 日

➤ 新华网

吴敬琏：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产业政策有不同类型，不可一概而论

一概否定产业政策或者一概肯定产业政策的人，其实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讨论的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因此，有些人心目中想到的产业政策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从日本和韩国引进的那种产业政策，或者叫做日本在五、六十年代所采取的那种产业政策。其实，这只是产业政策的一种主要类型。

日本产业政策，是日本过去战时统制经济的遗产，也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经济学家的助推，当时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两种——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前者。核心内容就是“运用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的手段，有选择地促进某种产业或者某些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现代化和产业的改组，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就叫做“有保有压，选择产业”。所以这种产业政策后来就被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1973 年，日本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石油价格猛涨，发生了长达四年时间的经济衰退，从 20 世纪 60 年代 10% 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负增长，这个时候，许多日本经济学家就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怀疑。他们并不否定产业政策，而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之下，也应该靠政府的干预来弥补、补充市场失灵，来提升市场的功能。后来，日本的产业政策就开始从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向提升市场功能的产业政策转变。这些日本的经济学家提醒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点，要正确地判断市场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了真的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这对我们很有启发，从我们引进产业政策以来，存在把市场失灵泛化的倾向。有一些说法很明显是误读的，比如把市场失灵说成是市场天然的缺陷，这就等于把市场失灵泛化了，使得政府合理的干预就变成了没有界限的干预。

第二点，针对不同的市场失灵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第三点，认识到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的时候，还要注意，政府干预也是会失灵的，这就需要权衡。有时候，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采取市场干预措施，造成的损害比市场失灵造成的损害还要大。这就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使得收益最大、损失最小。

产业政策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从 1987 年我国正式引进产业政策以来，我们也经历了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担任国家计委产业规划司副司长的刘鹤，他长期做产业政策规划和执行的工作，在 1995 年写了一篇论文，非常明确地提出，应当用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来逐步替代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刘鹤把选择性产业政策叫做差别化产业政策）。他说变革的主要内容是：“逐步淡化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差别对待不同产业的色彩，以增强其产业的竞争力，反对垄断、保持竞争和广泛提供信息等原则来支持产业的健康发展，通过提供信息、建立市场秩序等方式，增强市场竞争功能的内容，将成为新的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这段话我觉得说得非常深刻，而且是切中时弊。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转变不但跟人们原有的观念相冲突，而且涉及到有关主体的利益。

比如 1973 年，日本的石油危机以后很多人的思想就开始转变，而且他们反对日本选择性产业政策，特别是学界的力量很强大，但改变仍然不容易。因为这些力量都是年轻一代的，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持有相同的意见，但是又跟老一代的经济学家没法达成一致，而老一代经济学家都是日本经济学界的“大佬”，很有地位。

我亲身经历的案例就是日本利用产业政策支持开发模拟式高清电视的失败导致的最后失败。当时各国都在开发高清电视，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 NHK 研究后选定了模拟式的技术路线。模拟式的方法确实有优势，比如只要加强扫描密度，马上清晰度就提高了，果然也首先取得了成功。但是模拟式电视机也有两个缺点，首要的缺点是创送流程复杂，成本高——因为它传播的时候不能用数字信号，是模拟式的波传播进来，接收以后变成数字，处理完以后再转化成模拟波。

这个时候，美国非常担心，因为美国不是由哪个政府机构来选定技术路线的，而是各家自己搞自己的，于是在 1990 年出现了数字电视的苗头，但是因为数据量大，也比较复杂。就这样，日本太注重短期利益，所以大量的产业政策都去支持开发性研究，而不注意基础性研究，而美国的基础研究比日本强得多。通过基础性研究，也就是说算法的研究，美国解决了信号的压缩和解压缩问题。当信号的压缩和解压缩问题解决以后，传输就不成问题了。所以，日本便吃了一个大败仗，举国之力投资搞的模拟式高清电视全部打了水漂。

最近，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所请日本嘉宾来讲，在 90 年代后，日本的政府对于强化竞争政策，消除政府选择性干预的影响所做的工作。他们说日本的四任首相都致力于消除旧体制和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来强化竞争政策，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完全成功，这个事情非常艰巨。实际上也是这样，刚才讲到刘鹤在 1995 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意见学界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对，说的很准，但是进展起来非常的困难。

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效率具体的表现，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有两种办法去实现，一种办法是用行政的干预、有选择地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另外一种办法，就通过提升市场的作用、通过加强竞争来实现。中国的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今后也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核心部分，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去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

现在很有必要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怎么样进行产业政策的转型呢？

第一，要认真总结 30 年来执行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改进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去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职责是什么呢？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在我们现实条件下，实现转化的要点就在于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改变过去所提出过的政府经济政策的中心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只是竞争政策的辅助。所以，我们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实现这个转型的要点就在于，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

第二，进行产业政策转型很重要的前提是，要按照党中央决定的方向，充分吸取中外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成果。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怎么来执行产业政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有许多好的成果值得吸取。

比如，罗德里克有一本书《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里讲，现在不是要否定产业政策，也不是要制定更多的产业政策，而是要有更好的产业政策。他提出一个问题叫“信息的外部性”，即对企业来说，有一个市场失灵，就是因为他很难取得产业进一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取得是有外部性的，拿到正确的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要消除这个外部性，政府其实可以做很多工作。

第三，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许多方面不应该用行政方法介入，而有些方法能够提升市场的功能，能够强化竞争，政府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finance.china.com/zlpsym/11176434/20171009/31549599.html>

来源：新华网 2017 年 10 月 09 日

➤ 财新网

吴敬琏：合适的产业政策要能够推进竞争

“产业政策的争论非常有意义，但是这一轮的讨论到目前为止，进行得好像并不那么令人满意。”11月12日，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产业政策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对近期的讨论略表失望。

他认为，第一个问题，应该讨论的是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而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在国际上，产业政策从中国开始引入的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有很多进步

和变化。最近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在争论的，更多是日本早期——战后一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执行的产业政策，即选择性产业政策，而非功能性，或称横向定义的产业政策。

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要不要？“国际主流和日本国内都已经有了答案了，再搬出来讨论意义就不那么大了。”他说。

他进一步表示，历史上有过的讨论以及相应的文献，很多都被遗忘了，又重头走一遍，这样走不了多远。CIDEG 组织这场产业政策研讨会，接下来希望将相关文献再介绍给国内，也是为了让讨论在过往文献的基础上深入。不一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至少要给前人“做一个接力赛”，才有可能把研究深入下去。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自身的情况。他表示，中国实行的产业政策是照搬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就是政府运用一系列的调控手段，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一些产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日本主要用到的产业结构政策与中国主要用到的产业组织政策，还是有区别的。后者本质就是扶植大企业，行业太分散不行，要提高产业集中度。

“青木教授（注：已故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青木昌彦）提醒我注意一条，他说日本政府没有中国政府强大。”吴敬琏说。日本经过麦克阿瑟的民主改革，政府没有那么强大。日本想把乘用车产业塑造成三个公司，本田反对，就推行不了。中国政府则能规定“三大三小”的行业格局，甚至连已有出口的汽车企业也一直没进准入名录。

针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在同场讨论中提到的，产业政策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化方向的转型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吴敬琏表示，产业政策对于原来的计划经济，确实是一个进步、改良，但是与市场经济的设想相比，是一个退步。

第三个问题主要关于竞争政策。他指出，目前政府已经有一些改变，实际上是要强调竞争政策。在去年深改小组通过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要树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换句话说，中国政府管理和领导经济要从过去主要靠产业政策，到未来树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今年国务院就此发布了一个具体化的文件，即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第一步要对所有新的政策、规定是不是违反竞争原则进行审查，第二步还要对过去的各种政策、规则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就要改。

“我们目前使用的产业政策，到处都是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他说，现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讲的合适的产业政策，最大的要点就是要能够帮助推进竞争政策。

他举例称，比如要支持创新，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菲利普·阿奇翁(Philippe Aghion)就认为要用产业政策，方法可以是给补贴，但是面对行业中相对弱小的企业。因为如果不给补贴，弱小的企业很可能在竞争中退出这个领域，令大企业形成垄断。只有弱小企业留在该领域，强化了竞争，创新才有可能。而中国的做法通常不是这样。

吴敬琏最后表示，产业政策的问题说到底是顶层设计问题，即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到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该问题已做出结论，但是对具体的用语存在不同的理解，也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带来的矛盾。

第二个层次是，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是用产业政策去抑制竞争，由政府取代市场去配置资源，还是这两类政策良性互动，产业政策最重要的着力点还是保证有一个竞争的环境、竞争的体制能起作用，因为在很多领域，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发挥作用的，因此政府应该为市场起作用做出自己的努力，保证市场能够有效运转。

第三个层次才是各种具体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措施应该如何运用，去解决中国面对的问题。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economy.caixin.com/2016-11-15/101007681.html>

来源：财新网 2016年11月15日

➤ 腾讯财经网

德地立人：中国既要产业政策也要竞争政策

近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举办的“聚焦供给侧改革——来自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上，国家外国专家局专家建议委员会专家顾问，CIDEG 理事德地立人就八田达夫的发言做出评论，认为一个国家需要同时有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完全靠一个量来去发展的话，经济是不能够很好地持续发展的。

以下为发言内容：

我想谈两点，第一个是谈体会，第二个是对中国的建议。

体会是什么呢？首先八田先生非常明确地讲了一个观点，就说一个国家有了发展的战略，这发展战略主要两个，一个是产业政策，一个是竞争政策。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今天前面几位发言的先生都讲过，产业政策实际上是对某些行业的国家的干预来去做保护性的发展。另外一个就是竞争政策，就是开放各种限制，使得企业它能够在自由的环境当中能够自由竞争，它是对分配资源最有效的办法。

这两个就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一个国家两个不同的政策都要去采取？这里头就需要一个思考，八田达夫已经讲过，一个国家经历发展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量的发展，一个是质的发展。量的发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高各方面的资源。质的发展是什么呢？就提高它的生产率。完全靠一个量来去发展经济的话，它是不能够很好地持续发展的。经济要真的持续发展的话，需要的是提高生产率，需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

根据这样的情况，八田先生介绍了非常好的日本的情况，不管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初期也好，后来战争结束，被打败之后的日本财团解体也好等等各方面，不管是来自外压还是内压，它是开放了市场之后，日本的经济有很好的发展。

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到了一定的情况之下，日本的生产效率它有明显的下降。今天提到了 1973 年是对日本高速成长当中一个转折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为什么 1973

年日本的经济开始放慢？这是有很多理由的。但是八田先生观点，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那时候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原先国家主要采取的是对城市本身居民的提高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投资。1973年之后正相反，对地方的经济进行了很多的投资，使得日本经济长期生产效率降低。

这个问题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肯定是有争论的，我也不想多讲了，目前在中国的发改委也有一些支持什么产品的清单，也有一个什么适合，什么不支持，分三种，大概也许知道中国国内现在目前汽车行业已经有将近200个汽车公司的情况之下，在二十年前定的所谓三大三小的这个政策还没有撤，还在。一旦国家采用了这种产业政策之后，放开它很不容易。产业政策也许个别的情况之下，就市场失灵的时候可能需要的。但是现在主要需要的是竞争政策，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最关键，这是一点。

第二点，跟这个是有关系，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最近几年我确实感觉到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是做了一些在子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从刚才这些专家们的讲话当中知道，国有企业它如果不是做股权改革，政企分开，让企业的这些管理层市场化，来去受市场的监督，来去发展自己，恐怕是很成问题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提高效率问题，实际上它对整个它自己国有企业，自己所存在的其他的民营企业，其他的市场带来扭曲，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往后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

第三点就是刚才八田先生也讲到1973年城镇化过程当中，我有一个体会，现在大家都是讲一带一路，讲京津冀，也讲雄安新区的建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战略，如果是百年大计，或者千年大计，它的回报也是用一百年，一千年获得的，政府可以从大的方向提出这个问题，其他的还是要靠市场化。

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finance.qq.com/original/caijingzhiku/cyzc_ddlr.html

来源：腾讯财经网 2017年7月18日



欢迎关注 CIDEG 官方微信平台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编印

责任编辑：潘莎莉

审校：陈玲 赵静

签发：薛澜

电话：010-62772497 62772593

电子邮箱：cideg@mail.tsinghua.edu.cn

传真：010-62772497

网址：<http://www.cideg.tsinghua.edu.cn/>